

东正教会 - 第一部分（历史） - 第一章（起初）

Timothy Ware | 译 / Tim

2023 年 8 月 25 日

第一部分

历史

第一章 开端

村子里有一座深埋于地下的小教堂，入口处经过精心伪装。当一位秘密神父来到村里时，他就在这里举行圣礼和其他事务。一旦村民们认为自己安全了，没有受到警察的监视，那么除了看门的会待在外面（当陌生人出现就发出警告），所有的人都会聚集在小教堂里。在其他时间，崇拜则轮流进行.....

复活节崇拜是在一个国家官方机构的公寓里举行的。只有持有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入，我为自己和小女儿办理了通行证。大约有 30 人出席，其中有一些是熟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是一位老神父主持了崇拜。我们轻声唱着‘基督复活了’，但充满了喜乐..... 我在墓穴教堂崇拜中感受到的喜乐给了我生活的力量，直到今天。

这是两段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俄罗斯教会生活的描述¹。但如果稍加改动，它们很容易被当作尼禄或戴克里先时期基督徒崇拜的描述。它们说明了在十九个世纪的时间里，基督教历史是如何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今天的基督徒比他们的祖辈更接近早期教会。基督教最初是在一个非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少数人的宗教，如今它再次成为少数人的宗教。早期的基督教会与国家是政教分离的；而现在，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传统联盟亦正在走向终结。基督教起初是一个被政府禁止和逼迫的宗教（*religio illicita*）；如今，迫害已不再仅仅是过去的事，在 1918 年至 1948 年的三十年间，为信仰而死的基督徒人数比基督受难后的三百年还要多，这绝非不可能。

东正教徒尤其清楚这些事，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直到最近一直生活在反基督教的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之下。基督教历史的第一阶段，即从圣灵降临节到君士坦丁归信，对当代东正教有着特殊的意义。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徒 2:2-4）。基督教会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圣灵在五旬节，即第一个圣灵降临主日降临到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身上。同一天，通过圣彼得的布道，三千名男女接受了洗礼，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基督教团体就此建立。

不久，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就因圣司提反被投石打死后而遭迫害四散。正如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 28:19）。他们遵从这一命令，传道至所及之处，起初是向犹太人传道，但不久也向外邦人传道。圣路加在《使徒行传》中记录了这些使徒旅行的一些事件，其他

¹ 摘自期刊 *Orthodox Life* (Jordanville, N.Y. 1959), no. 4, pp. 30 -1.

事件则保存在教会的传统中。在很短的时间内，罗马帝国的所有主要中心城市，甚至在罗马边境以外的地方，都出现了小规模基督教团体。

第一批基督教宣教士所及之处贯穿帝国，尤其是其东部地区，是一个有许多城市的地区。这决定了初期教会的行政结构。基本单位是每个城市的团契，由自己的主教管理；有长老或司祭和执事协助主教。周围的农村则依靠城市中的教会。这种由主教、司祭和执事组成的三重职分模式在一世纪末已经在一些地方形成。我们可以从安提阿主教圣伊格纳丢（St. Ignatius）大约在 107 年写的七封短信中看到这一点，当时他正前往罗马殉道。伊格纳丢特别强调了两件事，即主教和圣餐；他认为教会既有秩序，又有圣礼。他写道：“每个教会的主教都代替上帝主持教会”，“没有主教，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与教会有关的事情……主教出现在哪里，会众就在那里，正如耶稣基督在哪里，大公教会就在那里。而主持圣餐礼——‘不朽之药’，乃主教首要和独特的任务。”²

今天，人们常认为教会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其中每个地方机构都是一个更大、更具包容性的整体的一部分。伊格纳丢并不这样看待教会。对他来说，地方教会就是教会（大写）。他认为教会是一个领圣餐的团契，只有在欢庆主的晚餐，在圣礼中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时，教会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本质。但是，圣餐礼只能在本地举行——在每一个聚集在主教周围的特定团体中举行；在当地举行的每一次圣餐礼中，在场的是整个基督，而不仅仅是基督的一部分。因此，每一个地方团体在主日庆祝圣餐礼时，就是完整的教会。

伊格纳丢的教导在东正教传统中占有永久的地位。东正教仍然认为教会是一个圣体团契，其外在组织无论多么必要，对于其内在的圣事生活来说都是次要的；东正教仍然强调地方教会在教会（大写）架构中的极端重要性。对于那些参加过东正教侍奉圣礼³的人来说，当主教在仪式开始时站在教会中央，被他的羊群簇拥着时，安提阿的伊格纳丢关于主教是地方教会合一中心的观点就会显得格外生动。

但是，除了地方教会，还有更广阔的教会合一。这第二个方面在另一位殉道主教迦太基的圣居普良（卒于 258 年）的著作中得到了阐释。居普良认为所有主教都分享一个主教职分，但分享的方式是每个人拥有的不是一部分，而是整体。他写道：“主教职分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每个主教都完全拥有它。教会也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尽管它随着其生养能力的加赠而扩展为众多的教会”⁴。教会会有很多，但只有一个；主教会有很多，但只有一个主教职分。

在教会的前三个世纪中，还有许多人像居普良和伊格纳丢一样以殉道者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诚然，逼迫往往是地方性的，而且通常持续时间有限。然而，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当局对基督教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宽容，但逼迫的威胁始终存在，基督徒们知道，这种威胁随时都可能成为现实。殉道思想在早期基督徒的灵性观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他们认为自己的教会建立在鲜血之上——不仅是基督的宝血，还有那“另一些基督”——殉道者的鲜血。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当教会变得“稳固”，不再遭受逼迫时，殉道的观念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其他的

²达玛格尼西亚人书, vi, 1; 达士每拿人书, viii, 1 and 2; 达以弗所人书, xx, 2.

³侍奉圣礼：东正教徒通常用这个词来指圣餐仪式、圣体或弥撒。

⁴论教会的合一, 5.

形式出现：例如，希腊人经常将朴修生活视为“殉道”。西方也有同样的做法：例如，凯尔特人的一篇文章——七世纪爱尔兰的一篇颂词——将朴修生活比作殉道的路径：现在，有三种殉道方式被视为人可背负的十字架，即白色殉道、绿色殉道和红色殉道。白色殉道是指一个人为了上帝而舍下他所爱的一切……绿色殉道是指一个人通过禁食和劳动，使自己摆脱恶欲，或者在忏悔和悔改中忍受劳苦。红色殉道则是为了基督而忍受十字架或死亡⁵。

在东正教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红色殉道极为稀少，绿色和白色殉道则占据上风。然而有一些时候，尤其是在本世纪，东正教徒和其他基督徒再次被呼召去接受血的殉道。

正如居普良所强调的那样，主教们共享一个主教职分，他们自然应该一起召开会议，讨论共同的问题。东正教一直非常重视大公会议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东正教认为，大公会议是上帝选择用来引导祂的子民的主要方式，并认为大公教会本质上是一个大公会议教会。（事实上，在俄语中，同一个形容词 *soborny* 具有“大公”和“会议”的双重含义，而相应的名词 *sobor* 既指“教会”也指“大公会议”）。在教会中，既没有独裁，也没有个人主义，而是和谐与一致；教会成员保持自由，但并不孤立，因为他们在爱、信和圣礼共融中联合在一起。在大公会议中，这种和谐与自由一致的理念可以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在真正的大公会议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其他成员，而是每个成员都与其他成员协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自由地达成“共识”。大公会议是教会本质的生动体现。

使徒行传 15 章描述了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使徒们出席了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会议，以决定外邦人应遵守摩西律法到何程度。使徒们在最终做出决定时，用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显得冒昧的措辞：“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使徒行传 15:28）。后来的大公会议也曾大胆地以同样的信心说话。独立的个人可能会犹豫是否该说‘因为圣灵和我定意...’；但当大公会议聚集在一起时，教会成员就可以共同宣称他们个人都不拥有的权威。

耶路撒冷大公会议聚集了整个教会的领袖，是一次特殊的聚集，直到 325 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才有类似的聚集。但在居普良的时代，召开由罗马帝国某一行省的所有主教参加的地方会议已成为惯例。这种地方会议通常在省会召开，由省会主教主持（省会主教被授予都主教称号）。进入三世纪后，会议的范围扩大，开始包括来自多个省份的主教，而不是一个省份的主教。这些规模较大的会议往往聚集在帝国的主要城市，如亚历山大或安提阿；因此，某些大城市的主教开始获得高于各省都主教的重要性。但是，关于这些大主教区的确切地位，那时暂还没有任何定论。在三世纪，主教会议的不断扩大的也没有达到合乎逻辑的程度：迄今为止（除使徒会议外），只有规模或大或小的地方主教会议，而没有由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主教组成、声称以整个教会的名义发言的“总”大公会议。

312 年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教会的外在环境。当君士坦丁皇帝率领军队穿越法国时，他抬头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前方有一个发光的十字架。十字架上刻着：以此征战。由于这个异象，君士坦丁成为第一个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罗马皇帝。在法国的这一天，一连串事件被启动，结束了教会历史的第一个主要时期，并使拜占庭基督教帝国得以建立。

⁵引用自 J. Ryan, *Irish Monasticism* (London 1931), p. 197.